

民族地区水库移民可持续生计资本及其 生计策略关系研究

李丹, 许娟, 付静

摘要: 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为基础, 提出脆弱性背景下, 移民五大生计资本、民族文化遗产及制度政策环境影响移民生计策略, 移民的脆弱性感知对其生计策略有调节作用。对四川、云南两地移民村实证研究表明: 少数民族地区水库移民的社会资本同质性强, 民族语言、习俗保存较好, 但生计资本总量不足, 人力资本极其短缺, 自然资本较搬迁前明显减少, 务工收入成为其金融资本的主要来源, 不同生计资本变化的组合导致不同的生计策略。应关注移民中的弱势群体与弱势生计资本, 加强下一代移民职业教育, 提供正规发展资金扶持, 加强医疗保险救助, 促进文化之美的少数民族可持续生计发展。

关键词: 水库移民; 民族地区; 生计资本; 可持续生计

中图分类号: F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15)01-0051-07

一、引言

自新中国成立至 20 世纪末, 近 9 万座水库以及 120 多万千米道路等工程建设产生了 5 000 多万工程移民, 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村人口^①。西南民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分布最集中的地区, 地形地貌复杂多样, “大分散、小聚居”的自然居住格局使各民族间形成了相对孤立、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1][15]}, 同时, 该地区又是黄河、长江两大水系及流向东南亚国际河流的水源涵养地, 是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加上贫困人口众多、贫困程度深, 使西南民族地区兼具生态脆弱、文化敏感与人口贫困等特征, 为农村水库移民生计转移与可持续发展增加了难度, 也为民族文化的变迁与整合提出了挑战。脆弱性贫困理论、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等为此提供了较好的研究视角。国外关于“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的探讨始于 1980 年代末。Chambers 等将“生计”定义为“谋生的方式, 并建立于能力、资产和活动的基础上”, 认为“可持续生计是一种能够应对压力和打击并从中得到恢复, 能够保持乃至加强其能力和资产, 在惠及本地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其他生计活动的同时, 还能为下一代提供机会的生计”^[2]。Scoones 将生计资产细分成人力、自然、金融和社会资本四大部分, 强调可持续生计不仅能够应对压力和打击并从中得到恢复, 能够保持甚至加强其能力和资产, 同时又不损坏自然资源基础, 这种生计才是可持续的^[3]。英国国际发展机构 (DFID) 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Sustainable Livelihood Approaches, SLAs), 阐明了在特定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背景下, 个人和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强制性社会变迁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户可持续生计发展研究”(12YJA630056); 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研究专项“贫困地区生态移民可持续生计发展研究”(skqy201309)

作者简介: 李丹,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四川成都 610051); 许娟,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数据根据世界银行报告《中国非自愿移民》(1994)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历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家庭如何通过五类生计资产(自然、物质、人力、社会、金融)追求不同的生计策略,进而影响不同生计结果的产生,实现生计的可持续性。

可持续生计将静态与动态分析相结合,在横向上考察农户所能获得的各种生计资本对生计的现实支持强度,在纵向上考察农户不同时期或代际间生计发展的可持续。在强制性变迁背景下,水库移民可持续生计发展可做如下理解:在以历史性记的时间概念下,以家庭为单位,农户的生存与发展呈现出的增量值的度量。当这种增量值为正,且其增长速度大于家庭因人口增加、环境变化、社会需求等因素变化速度时,农户生计是可持续的;当这种增量值为负,在可预期的时间内,农户生计资本将枯竭,则生计是不可持续的。

二、少数民族农村水库移民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生计方式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或群体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地质特征是一个民族生计方式的基础,而气候条件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民族的消费习俗,影响着他们的生活节律和社会组织的结构及运作。”^[4]民族地区农户在有效应对和利用自身生存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特有的生计方式。西南民族地区地理环境极为复杂,跨越我国三个地势阶梯,多变的自然环境使得该地区生产形态、生活方式以及民族文化多彩多样,其农户的生计方式不仅与我国其他地区差异较大,而且在本区域范围内也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这使得民族地区农户可持续生计及生计资产的测量呈现如下特征:(1)地理地貌的多样性导致环境状况描述界定的多元性,从而增加了应对环境变化直接支付成本的度量难度。(2)民族族群、民俗文化及宗教信仰的多样性,使家庭生存需求计量更为复杂。(3)民族地区现行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导致在现有经济评价模式下获取各种生计资本,如人力与金融资本等,较之其他地区更为困难;而亲邻守望互助的社会资本则较为强大。

基于其特殊性,本文在可持续生计理论上,提出了“少数民族农村水库移民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Dam Resettlements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pproaches in Minority Region),如图1所示。与传统的SLAs不同的是:本文认为“民族文化遗产”与传统的五大生计资本将共同影响生计策略发展,如宗教与民俗的商品化形式与消费时尚的结合对民族旅游产业的催生作用;而农户的脆弱性感知对其生计策略有调节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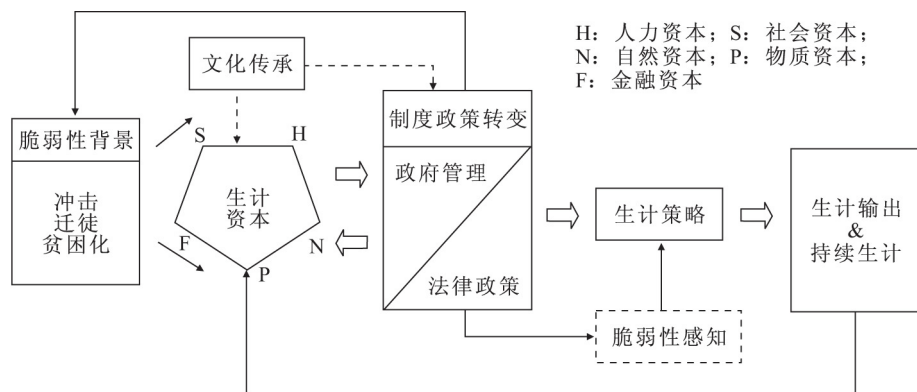


图1 少数民族农村水库移民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脆弱性背景是生计分析的前提,五大生计资本是核心,指移民家庭拥有的资源、能力和发展的机会。民族文化遗产包括民族语言、习俗、宗教信仰及价值观的传承,“存在于文化生态系统中,影响实体经济的运作。忽略这种资本,将可能导致文化系统崩溃,进而导致福利与经济产出的损失”^[5]。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呈现低密度人口分布状态,社会人际关系的缺乏容易引发人的孤寂感,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得顺从、忍耐、克制和禁欲等心理机制对当地居民的生存意义极大。“信仰社区”成为西

南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的人际互动形式之一^{[1][P32]}。在这种环境中,宗教信仰、传统习俗以及价值观直接决定人的行为结构,对个体及家庭生存路径的选择、生存能力的构建、生存资源的获取等具有战略性、长期性影响。在农村移民生计资本向生计策略与生计结果的转换过程中,受到制度政策、法律、教育资源获取、接收地社区环境等影响。此外,农户自身对生计风险或脆弱性的感知也是生计资本向生计策略转换中的调节变量。因此,与传统 SLAs 中风险是由局外人(如专家或政府官员)预先所定义的不同,只有将“农户对风险或脆弱性感知”纳入西南少数民族水库移民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才能更清晰地了解农户实际是如何将风险和生计策略联系起来的,也才能提出更有效的扶贫减贫措施^[6]。

三、四川、云南少数民族水库移民生计资本调查与分析

(一) 调查区域及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四川省凉山州盐源彝族自治县双河乡及云南宾川新川村移民集中安置地所做的实地调查。调查实施于2013年7—8月。

盐源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雅砻江下游西岸,幅员面积8398平方公里,相对富足的土地资源使其成为安置锦屏一级和二级两大电站移民的主要安置地。凉山州坚持移民县内安置为主,投亲靠友分散安置占到80%以上。这种以亲属关系为纽带的迁移安置有效地促进了移民的社区融入与经济融入,其环境变迁的剧烈性远不如跨县迁移者。因此,本次调研对象专注于跨县安置的少数民族群体。针对少数民族移民一般采用整村搬迁、集中安置的方式,本次调查选取的双河乡是一个代

表性集中安置村。其代表性体现在:(1)少数民族聚集,以苗、彝族为主;(2)生产、生活环境面临重大变迁;(3)迁入地社区环境建设较好,有稳定发展的基础。该村移民搬迁安置刚好有2~3年时间,可以较好地反映其生计发展现状,同时移民也能较清晰地回忆起搬迁前的生计情况。云南宾川县新川村是小湾电站移民集中安置点,也是跨县迁移,少数民族聚集,以彝族为主、藏族与傈僳族为辅,同样面临资源环境与生存空间的剧烈变迁。

本次调查由当地村干部支持,先按农户家庭收入实施分层抽样,然后由村干部带领调查人员进行入户访谈。调查中针对中老年彝族受访者配置了口语翻译。调查项目包括基本的人口统计特征、各项生计资本状况、迁移前后的变化及公共设施与服务供给情况等。盐源县双河乡收集有效问卷48份,云南宾川新川村收集有效样本49份,占总户数的1/3。

(二) 生计资本测量方法及结果

本文对于生计资本的测算方法借鉴了 Sharp^[7]、李小云等^[8]的研究成果。

1. 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指农户家庭成员在现阶段体力、智力、技能及健康水平总和的存量值,其数量和质量决定农户能否运用其他资产。本文对人力资本的测量设立两个指标,第一个是家庭整体劳动能力,即处于不同年龄层次和健康状况的家庭成员所拥有的劳动能力总和,即 $\sum LQ_i$ 。第二个指标是家庭整体受教育程度,按文盲、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本科或大专和本科以上分别赋予0~5分值,统计出家庭智力资本总存量的绝对值 $\sum EQ_i$ 。由于户主往往对生计的影响力大于家庭其他成员,因此用户主受教育水平分值 $\sum EQ_{户主}$ 与家庭受教育水平均值 $\sum EQ_i/N$ 的比例对该值进行修正,得出家庭智力资本总存量的相对值。此外,参加过技能培训或有技术等级的可相应转换成教育年数以便

表1 四川、云南调查受访人基本情况

		频次	百分比
性别	男	79	81.4
	女	18	18.6
民族成分	羌族	2	2.1
	彝族	39	40.2
	汉族	11	11.3
	藏族	5	5.2
	傈僳族	11	11.3
	苗族	26	26.8
	蒙古族	3	3.1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54	55.6
	初中	39	40.2
	高中及中专	4	4.2
年龄	均值	38.85	
家庭人口数	均值	4.88	

于计量。最后，还应赋予劳动能力、智力资本和技能不同的权重，此处用 a_i 表示。得到农户家庭人力

$$HC = a_1 \sum_{i=1}^n LQ_i + a_2 \sum_{i=1}^n EQ_i * \frac{EQ_{\text{户主}}}{(\sum_{i=1}^n EQ_i / N)}$$

2. 自然资本。自然资本主要指人们能够利用和用来维持生计的水、土地和各种生物资源，其质量和面积决定了农户自然资本的大小。本文主要利用家庭耕地面积和耕地质量两个指标来衡量。不可定量反映的是农户搬迁前对于公共林、牧地的使用，但可间接从收入指标来看。

3. 物质资本。物质资本指农户家庭在具体生产和生活中所使用到的自然资源以外的物质，包括基础生产资料（农机、牲畜、住房、耐用消费品等）和公共基础设施（道路、学校等）两大类。在同一地区，基础设施对于所有农户是无差异的，而不同家庭所拥有的消费性或生产性设备存在差别。本文主要考察了家庭住房情况和家庭固定资产情况（生产性工具和耐用消费品）。

4. 金融资本。金融资本通常指用于购买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现金以及可以获得的贷款或个人借款，包括从正规金融机构（农业银行、信用社）和非正规渠道（亲戚、朋友）两种渠道获得的资金。本文将家庭年现金收入、获得信贷或私人借款的数量、牲畜资源和农户借款的可获得性作为衡量金融资本的四个指标。

5. 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指一种镶嵌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9] [P140]}，“是个体之间的联结——包括社会网络及其派生的互惠规则及信任”^{[10] [P19]}。社会资本的概念化与操作变量具有多样性与多维度^{[11] [P12]}。本文重点关注个体层面的社会网络，根据民族地区的特征，设置两个指标进行测度，即农户获得社会网络帮助情况和每年参加红白喜事的次数。

最后，针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本文从农户对语言及习俗、民族手工艺、民族服装制作、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测度。为简化数据处理，最后选取了民族语言的运用和对民族风俗的了解程度两个指标来反映文化传承情况。其他方面则通过定性分析来揭示。

对上述几种生计资本的测量，详细公式不再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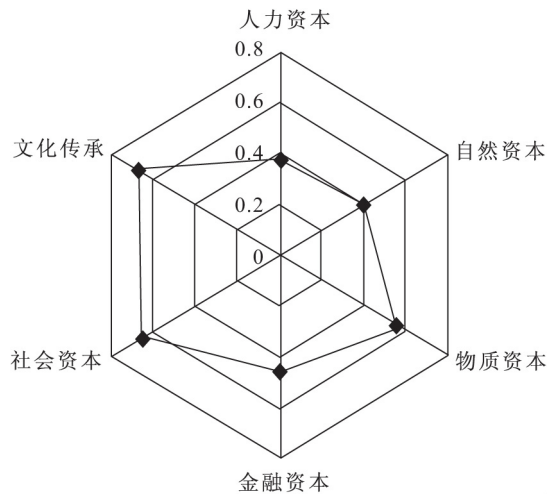


图2 少数民族水库移民生计资本雷达图

根据调查结果与指标运算，得到移民五大生计资本及文化传承情况的数值，如图2、表2所示。

表2 少数民族水库移民生计资本测量结果

资本类型	测量指标	指标符号	指标公式	指标值	资产数值
人力资本	家庭整体劳动力	H1	$H1 \times 0.5 + H2 \times 0.5$	0.43	0.38
	家庭整体受教育程度	H2		0.34	
自然资本	家庭耕地面积	N1	$N1 \times 0.5 + N2 \times 0.5$	0.30	0.39
	耕地质量	N2		0.47	
物质资本	家庭住房情况	P1	$P1 \times 0.5 + P2 \times 0.5$	0.63	0.56
	家庭固定资产情况	P2		0.49	
金融资本	家庭年收入	F1	$(F1 + F2 + F3 + F4) / 4$	0.61	0.47
	获得信贷的机会	F2		0.41	
	牲畜资源	F3		0.35	
	农户借款可获得性	F4		0.50	
社会资本	获得社会网络帮助	S1	$S1 \times 0.5 + S2 \times 0.5$	0.73	0.65
	参加红白喜事的次数	S2		0.57	
文化传承	民族风俗的了解程度	C1	$C1 \times 0.5 + C2 \times 0.5$	0.70	0.67
	民族语言的运用情况	C2		0.64	
总和					3.12

由图2可知,四川、云南两地少数民族移民生计资本总得分为3.12,以总值6分为基准,说明移民生计资本总量不足。如果除开“文化遗产”的得分,其他五大生计资本总分值仅为2.45,低于2.5分的均值。

分维度来看,得分最低的是人力资本,仅0.38,反映了农户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总体劳动力状况均不佳,农户中老人与小孩受赡养人口比例较大,整体受教育水平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54.6%。其次是自然资本,得分0.39。与搬迁前相比,农户的土地数量明显减少,以往用于支持生计的放牧地、林地等不可复得,从而对移民的收入造成了负面影响。土地质量较以前有所下降,说明调剂土地的困难及安置接收地的抵制。农地面积与质量直接影响农户的农业收益,不仅加大了支出,而且带来移民劳动力的富余。第三是金融资本,得分0.47。农户普遍反映收入不如以前,主要减少在牲畜持有量、森林采摘(如采菌子、中药材等)两方面,与搬迁后自然资本的减损呈正相关。但积极影响是由于交通更方便,导致进城务工人员增加,打零工成为主要生计支持之一,占到受访户的60%以上。此外,从正规渠道获得贷款机会较小,手续繁杂且利息偏高。农户更倾向于向亲戚朋友借钱,说明亲友关系网络对少数民族移民的生计支持更大。第四是物质资本,得分0.56。移民搬迁后住房条件普遍得到较大改善,一户一院,安置补偿金也主要用于建房。家庭固定资产情况与以往相比变化不大。第五是社会资本,得分0.65,是五大生计资本中评价最高的。以往的相关研究普遍认为,移民的社会关系因为搬迁而中断,社会资本受冲击最大。但本次调查发现,因为少数民族移民秉承了同民族集中安置、整村集中安置的原则,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保留了原有的乡邻关系。同时,新的安置地又为其提供了新的社会网络。通讯与交通的便捷对移民社会资本的变迁与重建具有积极作用,移民走村访友、参加红白喜事的频度很高。但移民的社会网络呈现高度同质性与单一性,这也验证了少数民族农村社区亲邻守望与互助的社会资本相对强大。最后,文化遗产的得分为0.67,高于其他五大生计资本,但这里仅仅反映了移民对于其民族风俗的了解及民族语言的运用情况较好。大多数少数民族家庭均可用双语交流,但年龄较大的移民特别是妇女只能运用本民族语言,对外交流甚少,反映了少数民族妇女受教育及参与社会活动受到的排斥。随着移民安置时间的推移,少数民族的语言与习俗传承将可能日益退化,因为城市化的工作机会将更多地依赖于对于汉语的熟练程度及对城市文化的熟悉。

四、少数民族水库移民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关系

生计策略是指农户为实现其生计目标,对各种资本的利用配置及对经营方式的选择。Scoones 提出农业集约化、生计多元化及移民三种生计发展策略^[3]。不同的生计策略必然匹配于不同的生计资本组合及外部环境,如从封闭的山区搬迁到人口稠密的城镇,为农户提供了打工与经商的外部环境。根据前述调查,本文将生计策略分为农业型和兼业型两种。农业型指农户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要生计来源。兼业型指农户从事农业以外的工作为主。由于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包括收入与支出)与迁入地经济环境变化显著,由此导致农户生计策略变化,故提出以下7个假设。

假设1 务农人数越多的家庭偏向于农业型生计策略;

假设2 务工时间长(超过六个月)的家庭偏向

表3 假设检验结果

原假设	测试	sig.	结果
假设1	独立样本 Mann-Whitney U 检验	0.002	保留原假设
假设2	独立样本 Mann-Whitney U 检验	0.008	保留原假设
假设3	独立样本 Mann-Whitney U 检验	0.030	保留原假设
假设4	独立样本 Mann-Whitney U 检验	0.042	保留原假设
假设5	独立样本 Mann-Whitney U 检验	0.132	拒绝原假设
假设6	独立样本 Mann-Whitney U 检验	0.021	保留原假设
假设7	独立样本 Mann-Whitney U 检验	0.349	拒绝原假设

于兼业型:

假设3 家庭打零工人数越多越偏向于兼业型;

假设4 家庭农地面积越大,越偏向于农业型;

假设5 家庭农业收入数量影响其生计策略;

假设6 家庭工资性收入影响其生计策略;

假设7 家庭总支出影响其生计策略。

本文利用非参数分析方法,运用 SPSS 20.0 对以上 7 个假设做独立样本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假设 1、2、3、4、6 通过了验证,假设 5、7 未通过验证。结果讨论如下:

第一,拥有较多土地资源的移民农户更倾向于依靠农业生产作为其主要的生计策略。比如四川盐源地区农户从事苹果种植、特色蔬菜种植及烤烟种植,云南宾川移民种植红提。虽然这些特色经济作物对于提高农户收入贡献很大,但移民家庭土地数量的局限及学习曲线使得移民的农业收入在初期几年达不到当地农户的收入水平。移民涉足于这些特色农业项目的条件更主要是基于移入地的资源、经济与政策环境,例如宾川已成为中国的红提基地,盐源成为中国的烤烟、苹果基地之一。这反映了移民的生计发展策略是自然资本与外部制度、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二,从事非农职业的人数越多,在外务工时间越长的农户,越倾向于兼业型生计策略。调查显示,35%的农户采取了兼业型生计策略,家庭中青壮年劳动力长期在外打工(持续打工半年以上)或以经营小商铺为主要生计来源。在这类农户中,农业生产在家庭经济中退位于辅业,基本满足于自给自足。

第三,拥有金融资本更多的农户倾向于从事非农活动。外出经商或经营家庭副业成为主要收入来源,比如获得补偿金高的农户在城镇安置后,利用手中资金与贷款资金修造房屋作为出租用,其租金收入成为主要生计保障。搬迁前做生意的家庭由于有资本积累,在搬迁后很快也能重建经营。

第四,家庭农业收入与总支出对生计策略没有影响。

最后,调研发现移民家庭视重大疾病、重大自然灾害(特别是干旱)、农业病虫害为主要风险,这些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也显示了农户对医疗保障不足的担心。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 民族地区水库移民的生计资本及生计活动因迁移受到较大冲击

移民需要从生态环境、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就业技能、社会环境甚至思维方式等方面重新适应并逐步达到与安置地的融合。这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尤其对于老年人及中年以上的妇女更是严峻挑战,因此要对弱势群体给予积极关注与社会扶持。

(二) 少数民族移民人力资本偏低,影响其生计方式的转型与提升

应充分发挥教育与培训政策的作用,分人群定对象,进行后期人力资本开发与发展项目扶持。首先,新的生产技能、农业病虫害防治知识的习得都离不开组织性培训与学习实践。其次,针对少数民族农户子女较多的情况,应在现行民族地区的义务教育与中高等职业教育的基础上,加大激励力度,对困难家庭子女上学给予生活补贴,直到其完成中高等职业教育。只有当下一代移民生计可持续时,移民问题才能得到有效消解。

(三) 金融资本不足制约了移民生计领域的有效拓展

自然资本的稀缺尚可维系移民的温饱问题,但农业新品种的引入、新技能的获取或自我就业与小经营活动均离不开资金的支持。正规渠道贷款获取困难,无法满足移民拓展生计领域的迫切需求,因此建立专项扶持资金,针对移民实施低息或无息小额贷款,并进行经营的全过程辅导与监控,减少资金运用的风险,应成为后期扶持发展政策的重心。同时,在现有农村医疗保险基础上,对移民重大疾病应实施救助政策,防止其因病返贫。

(四) 少数民族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与知天乐命的价值观是宝贵的文化资源

在工业化与市场化进程中,保护民族文化基因十分难能可贵。应高度关注少数民族移民迁移过程中的文化变迁问题,保持少数民族语言、习俗及信仰的多样性,使猛烈变迁下的现代化过程与田园牧歌式的生计方式尽量合拍,从而达到和谐,是移民可持续生计发展的文化之美。

参考文献

- [1] 陈昌文. 圣俗边缘: 西部社会的环境、信仰和行为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5.
- [2] Chambers R. G. Conway.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 [Z]. Brighton: IDS Discussion Paper 296 ,1992.
- [3] Scoones J.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Z]. Brighton: IDS Working Paper 72 ,1998.
- [4] 罗康隆. 论民族生计方式与生存环境的关系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5) .
- [5] Throsby D. Cultural capital [J].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1999 23.
- [6] Forsyth T.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pproaches and soil erosion risks: Who is to judg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2007 34.
- [7] Sharp K. *Measuring Destitution: Integrat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in the Analysis of Survey Data* [Z]. Brighton: IDS working paper 217 2003.
- [8] 李小云,董强,饶小龙,等. 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应用 [J]. 中国农村经济 2007 (4) .
- [9] Lin N. 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al action [A]. Marsden P. V. ,N. Lin.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C].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2.
- [10] Putnam R.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2000.
- [11] Lin N. ,H. E. Bonnie. Theory ,measurement ,and the research enterprise on social capital [A]. Lin N. ,H. E. Bonnie. *Social Capital*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责任编辑 朱 蓓)